
市场不稳定性和经济复杂性： 新古典经济学在转型实验中的局限

陈平*

《经济研究》 2006 年 10 月

内容提要

“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凯恩斯革命的延续。他们否认大萧条的基本教训：即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和政府在市场稳定以及经济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线性均衡思维主导下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忽略劳动分工下的经济复杂性和多均衡态，结果导致苏东（前苏联和东欧）生产的大幅下跌。中国和苏东转型实验的比较研究，提出一系列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例如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和微观经济行为之间的连锁反应，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创造的学习空间，经济开放、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之间的相互作用等问题。转型萧条的惨重代价促使我们加深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包括经济原子间的供求分析、预算软约束理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学派等。中国基于学习、创新和分散试验的新经验，将使经济科学超越均衡优化的古典框架，走向研究非均衡演化的复杂经济学。

关键词：不稳定性，复杂性，非均衡，转型萧条

**Market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Complexity:
Limitation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in Transition Experiments**

Ping Chen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Center for New Political Economy at Fudan University

*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邮编 100871，电子信箱：pchen@ccer.edu.cn。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

Abstract: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nd ‘shock therapy’ approach to transition economies is an extension of counter-Keynesian revolution by new classical school in macroeconomics. They reject the basic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market instability and the active role of government in managing stability and growth. Their linear-equilibrium thinking policy of liberal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ignores economic complexities and multiple equilibria in division of labor. The result was severe output decline in East Europe and former Soviet Union (EEFSU) in last decade. Comparative experiments between China and EEFSU raise fundamental issues in economics, such as the chain reaction between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 and microeconomic behavior,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creating learning space in development, interactions between economic openness, sustainable growth, and social stability. The heavy cost of the Transition Depression sheds new light on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of atomic demand and supply analysis, theory of soft-budget constraints, microfoundations theory in macroeconomics, and the property rights school i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ew development policy based on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decentralized experiments will broaden our scope of economic science, from equilibrium-optimization framework in classical economics, to disequilibrium-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in complexity economics.

Key Words: instability, complexity, disequilibrium, transition depression,

JEL Code: P20, D50, E12, E12, E60, F31, N10

一、 忽视大萧条的历史教训带来的严重后果

中国理论经济学界最近有一场争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究竟应当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指导。笔者提醒争论双方一个简单的事实：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制定的休克疗法（又称华盛顿共识）在苏东（以下作为“前苏联和东欧”的简称）的推行，付出转型大萧条的惨重代价；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摸石头过河，不拘任何教条的中国改革取得了平稳转型和飞速增长。当代这一重大的历史事实不难启发我们：无论是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或者西方的主流经济学，都不足以指导当代的经济发展。今日中国已经不是五四时代的中国。“全盘西化”（苏俄化或欧美化）也好，宣传启蒙也好，都不能取代中国人独立的经济学研究。分析消化前人各个学派的有益成果，创新和发展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应当提上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议程。

本文着重讨论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两大流派——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学派，和凯恩斯代表的非均衡派以及熊彼特代表的演化经济学派，两种世界观之间的主要冲突。我们用大萧条和转型经济这样的社会实验来检验西方两大学派的理论基础。这将有助于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现代复杂科学方法的结合，来理解和上升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在科学综合前人各派理论的基础上，探索新政治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的前沿。我们希望把中国传统学派之间的站队之争，改为实践经验与学术流派之间的开放对话，从而使中国经济学界能参与世界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变革。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存在不同的学术流派。中国目前广泛翻译介绍的美国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反映西方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一家的观点，极大地淡化甚至忽视 20 世纪 30 年代诞生的演化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观点。他们之间的重大争论之一是关于市场经济和商业周期的本质，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互相冲突的观点（陈平，2004；Chen, 2005）。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学派认为，由于供求力量的自我改正机制，市场经济是自身稳定的（马歇尔，1964），经济波动主要由外部冲击所驱动（Frisch，1933）。相反，非均衡学派认为市场经济像有机体（Schumpeter，1939），同时具备动力不稳定性和相干有序结构。创新和科技进步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其经济特征表现为创造性毁灭、技术替代和生命节律。在政策分析上，均衡学派把注意力集中在恢复对均衡状态的短期偏离上，而非均衡学派主要关注中期经济波动的机制和有关的结构性变化。

就方法论而言，经济科学类似天体物理，自然实验成为检验理论的主要历史舞台。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是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自然实验，它动摇了古典经济学的信念，催生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研究了非自愿失业、金融市场的内生不稳定和政府的管理商业周期上的作用，在经济学上做出了革命性贡献（凯恩斯，1997；Minsky, 1975）。

可惜，凯恩斯革命只在宏观经济政策的领域取得部分突破。凯恩斯的弟子们受时代方法论的局限，在经济理论上并没有实现凯恩斯的梦想：即发展出非均衡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从方法论上来说，

抽象掉历史（非线性）和多样化（多均衡）的均衡过程较易于做数学模型。计量经济学倡导数学分析方法在经济学的应用，基于简单的线性代数的均衡经济学，迅速占据了西方的学术市场。但是均衡经济学在解释现代经济现象上的局限，虽然常被局外人戏称为扶手椅经济学，但是难得有机会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因为西方的经济政策系由利益集团而非经济学家左右。西方象牙塔内的经济学家，大多考虑数学建模的方便和美观，很少注意理论假设的经验基础。只有碰上大萧条这样的自然实验，才会痛定思痛，反省理论的经验基础。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均衡理论，系统构造了一个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乌托邦。建立在完全市场、完全竞争和优化行为基础上的微观经济理论，没有给技术创新和市场不稳定性留下发育的空间。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构造了一个有着唯一稳定均衡解的乌托邦市场（Arrow and Debreu, 1954）。金融理论中的有效市场假说声称股价总是对的，排除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Fama, 1970）。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经济的滞胀问题，给卢卡斯领导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提供了反击的机会。他们在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理论的旗号下，发起了反凯恩斯革命（卢卡斯，2000）。卢卡斯用简单的数学游戏，干脆否定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他声称失业是工人在工作和休闲之间自愿作出的理性选择，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努力纯属徒劳，因为理性预期下政府的宏观政策无法愚弄群众。20 世纪 80 年代产权经济学的流行，进一步否定政府干预的必要。交易成本理论否认制度演化中的路径依赖和多均衡可能。根据科斯定理，最优制度能通过产权的自愿交易建立，与初始条件是否合理（例如财富分配是否差距过大）无关（科斯，1994）。华盛顿共识的主要思想是反凯恩斯革命在后冷战时代的延续。它不仅否认了社会主义实验在后进国家工业化与福利建设上的重大成就，也否定了凯恩斯经济学应对商业周期和金融危机的基本经验。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是经验科学，而不是哲学的分支，那我们的问题是：经济理论的真伪能否通过政策实验来检测？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大家正在经历的转型经济，为我们检验各家争鸣的经济理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历史机遇。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或者休克疗法，其理论基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讲授的均衡理论（Williamson, 1990; Sachs, 2005）。均衡学派从均衡和优化的线性思维的方法论出发，构造世界向英美模式趋同的信仰框架。自由化政策创造的弹性价格系统在一般均衡下带来稳定和效率；产权和硬预算约束自信则是企业效率的制度环境；经济增长的动因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和技术扩散，没有后进国家自主创新的余地。他们不理解发展中国家的赶超面临巨大的经济技术差距和学习风险，发达国家的均衡策略和非均衡发展的现实严重脱离。按照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苏东的物质，科技，和人力资源比中国丰富得多，中外经济学家不难推测苏东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比中国快得多。西方投资者到九十年代初期仍然对中国不抱希望，因为中国面对人口众多、资源贫乏、

保守文化、和集权体制的历史重担。然而十余年的休克疗法之后，苏东经济出乎意料地大幅下滑，中国经济奇迹般的持续快速增长。规模空前的转型实验在苏东与中国之间令人惊奇的巨大差异，引发人们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质疑，尤其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带来的片面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World Bank, 2002）。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转型经济有几个特点与大萧条时期有所不同。首先，转型之前和转型之中并没有发生战争、天灾、或国际危机。其次，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大幅度下降，也并非以股票市场的崩溃或银行危机为前导。第三，苏东与中国的不同经济表现主要源于它们采用的不同经济政策：前者以“休克疗法”或华盛顿共识推动的自由化政策为特征（Sachs, 1994; Williamson, 1990），后者以分散试验、价格双轨制的渐进发展途径为特点（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Chen, 1993）。相比之下，大萧条期间的政策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这些特征使得转型实验发生的背景，在理论分析上远比大萧条简单明晰。

休克疗法源于西方经济学家应对 20 世纪 70—80 年代拉丁美洲的超级通胀的政策措施，在 90 年代初在苏东和东亚广泛推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萨克斯（Jeffrey Sachs），希来弗（Andrei Schleifer）等西方主流经济学者是倡导自由化、私有化、和政府放任政策的主要代表。中国的改革试验，主要受东亚经验的启发而非美国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包括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汇率和外贸政策的渐进管理，加上价格双轨制的转型创新。

下面我们先观察数据和案例。为了避免不同统计标准造成的争议，本文讨论的数据，采用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按国际标准校正过的统计资料，包括联合国统计，美国宾州大学世界统计表，世界银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数据。与国内统计数据比较，本文对中国经济的估计应当是保守而非高估的。世界各地在不同年代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参见表 1。

表 1. 以 10 年为间隔的 GDP 平均增长率 (%)

年代	1970s	1980s	1990s
东亚	4.5	4.4	2.8
东欧	4.8	2.4	-4.4 (绝对下降的幅度为 46%)
西欧	2.7	1.9	1.6
北美	3.3	3.0	2.8
南美	5.2	1.2	2.9

世界	3.6	2.7	2.1
日本	4.2	3.6	1.2
德国	2.6	1.7	1.6
中国	4.7	8.8	9.4
越南	-0.1	5.0	6.9
波兰	6.1	0.9	3.2
匈牙利	4.7	1.5	0.3
苏联	4.6	2.6	
俄罗斯			-4.8
乌克兰			-8.9

数据来源: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selectionbasicFast.asp>

由表一我们可以观察到两点。其一，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尽管发达国家，苏东经济增长都明显放缓，但苏东增长速度仍然高于欧美发达国家与世界平均水平，也无数据文革时期的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社会主义国家八十年代的人心思变，主要来自对计划经济理论与现实脱离的失望，而非严格意义下的经济危机。其二，80—90 年代苏东和中国越南间的增长态势互易，苏东是转型萧条，中国和越南则是持续增长。这两个基本观察，是我们进一步分析的起点。

二、大萧条和转型萧条中的典型现象

大萧条和转型萧条中的主要事实参见表 2 和表 3。我们可以看到转型萧条的破坏程度和持续时间比大萧条更严重。波兰的经济学者制造了一个专门用语“大大萧条 (The Greater Depression)”来特指苏东的经济衰退 (Kolodko, 2000)。萧条程度的比较可以测量从经济指标从波峰到波谷的下跌幅度，恢复期的界定为恢复到上次波峰水平的年份。不同时期采用的不同指标主要取决于当时统计资料的限制。

表 2. 大萧条 (1929-1942)期间工业生产的下跌幅度和时间长度

国家	下跌幅度 (%)	高峰-低谷日期	恢复年度	延续时间
美国	46.8	1929. 3- 1933. 2	1942	14 年
英国	16.2	1930. 1-1932. 4		
法国	31.3	1930. 2-1932. 3		
德国	41.8	1928. 1-1932. 3		
加拿大	42.4	1929. 2-1933. 2		
意大利	33.0	1929. 3-1933. 1		
波兰	46.6	1929. 1-1933. 2		
捷克斯洛伐克	40.4	1929. 4-1933. 2		
日本	8.5	1930. 1-1932. 3		

资料来源: “Great Depression, ” (Romer, 2004).

表 3. 转型萧条中真实 GDP 的下跌幅度与时间长度

	高峰期	低谷期	恢复期	时间长度 (年)	下降幅度 (%)
德国 (统一)	1992	1993	1994	1	-1.1
(1993 年、2003 年两次小衰退, 下降 -1.1%)					
东德 (地区) 在东、西德统一后经济下降了大约 30%, 统一后东德的 GDP 仅占全德的 7%。					
捷克	1989	1993	1999	11	-13
斯洛伐克	1989	1993	1998	8	-22
波兰	1989	1991	1996	7	-18
匈牙利	1989	1993	2000	11	-18

罗马尼亚	1987	1992	2005	18	-30
保加利亚	1988	1997	>2006	>18	-34
阿尔巴尼亚	1989	1992	2000	11	-40
爱沙尼亚	1990	1994	2002	12	-45
拉脱维亚	1990	1993	>2006	>16	-50
立陶宛	1990	1994	>2006	>16	-44
俄罗斯	1990	1998	>2006	>16	-43
乌克兰	1990	1999	>2006	>16	-61
白俄罗斯	1990	1995	2003	13	-45
格鲁吉亚	1990	1994	>2006	>16	-73
乌兹别克斯坦	1990	1995	2001	11	-20
阿塞拜疆	1990	1995	2005	15	-58
哈萨克斯坦	1990	1998	2003	13	-38
塔吉克斯坦	1990	1997	>2006	>16	-67
土库曼斯坦	1990	1997	2006	16	-41
蒙古	1989	1993	2002	13	-23

这里，低谷年代的确定主要参照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为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selectionbasicFast.asp>,

转型在苏东产生的贫困人口的比例见表 4。

表 4. 贫困人口比例

国家	统计年份	贫困人口比例 (%)
捷克	na	na
斯洛伐克	na	na

波兰	2003	17
匈牙利	1993	8.6
罗马尼亚	2005	25
保加利亚	2002	13.4
阿尔巴尼亚	2004	25
爱沙尼亚	na	
拉脱维亚	na	
立陶宛	na	
俄罗斯	2004	17.8
乌克兰	2003	29
白俄罗斯	2003	27.1
格鲁吉亚	2001	54
乌兹别克斯坦	2004	28
阿塞拜疆	2002	49
哈萨克斯坦	2004	19
塔吉克斯坦	2004	64
土库曼斯坦	2003	58
蒙古	2004	36.1
中国	2001	10
越南	2004	19.5

资料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

<https://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geos/xx.html>

这里捷克等七国的数据或缺。其余转型国家中，只有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转型过程中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迅速下降，从 1978 年的 2.6 亿人下降到 1997 年的 5 千万人。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数据，中国 2001 年的贫困人口为 10%，仅高于起点高的多的匈牙利。不同转型路线对大众收入分配而言的效果，无法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类托最优策略来解释，却不难用基本的政治经济学常识来理解。

我们对转型萧条的严重程度深感惊异。美国大萧条期间工业产出下跌约 47%，真实 GDP 下降了大约 25%，恢复到大萧条之前的水准花了 14 年，英国相对较轻，下降了 16%；中国 1959 年到 64 年的困难时期，真实 GDP 下降了 32%，但持续时间只有 5 年。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俄罗斯等、乌克兰等 7 国的转型萧条持续了 16 年以上，GDP 仍低于转型之前的水平。真实 GDP 的跌幅各国很不相同，从波兰的 18%，俄罗斯的 43%，乌克兰的 61%，到格鲁吉亚的 73%。从整体上说，转型萧条的严重程度大于大萧条。

大萧条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欧洲金融动荡，美国的股市崩溃，英国返回金本位制带来的通货紧缩，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犯的人为错误等等都有重大影响 (Romer, 2004)。可以说金融市场的内生不稳定性在大萧条中起主要作用。相比之下，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转型之前，苏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只是增长放慢，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东欧的迅速转型以 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和 1991 年苏联的瓦解为起点，政治因数强于经济因数。苏东全盘自由化，包括汇率、贸易、价格的自由化和迅速私有化，系历史上新执政的自由派以意识形态的狂热仓促推行，其政治目标在摆脱前苏联体系的控制，为“回归西方”而不惜一切社会代价。相比之下，中国和越南的执政党在转型过程中极为关注意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

我们要问：苏东的转型萧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让我们从转型过程的最单纯案例——德国的统一开始。我们发现，德国统一的经济政策与效果，为寻求东欧与前苏联产出下跌的直接原因提供了明确线索：原有劳动分工网络瓦解的危机起源于汇率自由化。

三、不均衡世界中的货币强权和不平衡贸易

一些经济学者把转型萧条归咎于“坏的政治学”而非“坏的经济学” (Roland, 2000)。例如，萨克斯认为西方援助不足是俄国不能保持币值稳定的主要原因 (Sachs, 2005)。我们发现，德国统一的经济政策与效果，为寻求东欧与前苏联产出下跌的直接原因提供了明确线索：原有劳动分工网络的瓦解起源于汇率自由化。换言之，任何价格体系的背后不仅是简单弹性的供求关系，而且是相应劳动分工体系下较具刚性的经济结构。

彻底推行休克疗法的典型例子不是波兰，而是东德 (Kolodko, 2000; Burda, 2006)。波兰经济学家很快意识到休克带来的只是痛苦而非疗法，在私有化导致大批企业破产与大量工人失业后，立即放慢了大型企业私有化的速度，从而在东欧较早地结束了转型萧条。

表面上，东德转型比任何国家都顺利。1989 年西德统一东德后，西德向东德全盘输出了自己的产权和法律体系，同时西德也向东德提供了历史上最大的财政援助，每年有大约 800—900 亿欧元（相当于东德 20% 的 GDP）的资金从西德注入东德持续至今，这比美国二次大战后马歇尔援助下的

西欧或者历史上任何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外来援助都要多。相应之下，东德几乎不存在通货膨胀，汇率贬值，或其他东欧国家面临的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危机。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后进地区的经济增长只是简单的向先进地区靠拢的收敛过程。用哈佛经济学家巴罗主张的宏观经济指标测量，东德的工资率，消费比率，生产率等经济指标，收敛到西德水准的速度远远快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预测（Burda， 2006； Barrow， 1992）。然而，两德统一 15 年后，不但东德的经济增长甚慢，失业率仍在继续上升，而且西德资本宁愿投资中国和其他东欧国家，却不愿投资自己的同胞东德，东德人才与青年在故乡看不到希望而大批移民外流。东德发展的艰难让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困惑不已。在历史上最好的外援条件下，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东德奇迹来验证均衡经济学的收敛理论和产权假说呢？

2004 年笔者在东德耶拿访问时，当地经济学家向我们介绍了著名的蔡司（Zeiss）光学仪器公司的历史，我们得以实地观察东德转型的案例。蔡司公司由于保持了科技创业的传统，没有多数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技术老化问题。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到现在，蔡司的光学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始终是最先进和最具有竞争力的，包括美国的宇航局和日本的索尼公司都要买蔡司的高级光学镜头装在自己的光学设备上。东德蔡司在 1989 年以前在苏联主导的经互会国家的光学仪器市场上更具领导地位。出乎意料的是，两德统一后该公司突然失去了 90% 以上苏东的市场份额，因为两德统一货币后，蔡司公司必须要求所有的交易用西方的硬通货（西德马克或美元）付款，中断了苏东的老顾客以货易货或用卢布进行交易的传统，结果不但立刻丧失了传统市场，又无法迅速打开西方市场，导致公司被迫重组大批裁员。

汇率自由化（实质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主权向西方金融强权的依赖化）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让我们这些学过西方货币均衡汇率理论的经济学家也大为震惊。回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史，硬通货（美元，马克，或英镑）的积累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缓慢的学习和竞争过程。外汇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并非仅由经济因素决定，还包括不对称的金融强权的影响。在本国金融实力还无法与国际金融强权对抗时，用国家外汇主权管制外汇交易是保护国内企业免受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重要手段。只有随着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市场网络的建设和外汇储备的积累，本国货币才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提高信誉，增加稳定性。发展中国家虽然可能在汇率自由化的同时，在短期外汇市场上达到所谓的外汇价格的均衡，却无法同时维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同时兼顾国内的经济增长和汇率稳定。均衡经济学假设均衡态同时兼具稳定和最优的经济状态，在实践上完全可能陷入经济萧条的均衡陷阱。蔡司公司的案例使我们推测，其他不具技术优势的苏东企业，在汇率自由化后的生存危机更为深重。苏东几十年形成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以经济互助委员会（CMEA）的国际贸易体系维系。休克疗法的倡导者鼓吹自由化的好处是减少西方外资进入的阻力，从而加速东欧向西欧收敛的赶超过

程。其结果却首先是经互会贸易体系的垮台和由此引发的东欧企业的过度倒闭，从而引发一连串的宏观经济危机。不但外资踟蹰不前，而且内资外逃的规模远大于外援的流入，在短短几年间实际瓦解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工业化留下的产业基础。

中国的外汇双轨制从 1980 年 4 月开始，维持到 1995 年 1 月，持续了 15 年。这充分显示国际贸易中的开放竞争是一个缓慢的适应演化过程，而非迅速的均衡收敛过程。中国的国际贸易在 1980 年有 18 亿美元的赤字，到 1994 年转为 54 亿美元出超，2000 年外贸出超上升到 241 亿美元；相应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从 1979 年的 8 亿美元逐步上升，1994 年为 516 亿美元，2000 年达 1656 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双轨制能够在 1994 年成功并轨，前提是出口导向型的增长使外贸由赤字转为盈余（图 1）。1979 年到 1994 年的 15 年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为 26%，是同期 GDP 增长率（为 9.5%）的两倍。相比之下，苏东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是进口增加和出口锐减，带来外贸和财政的双赤字。正如波兰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贸易自由化进程越快，初次冲击效果越大，随之而来的衰退越深。”（Kolodko，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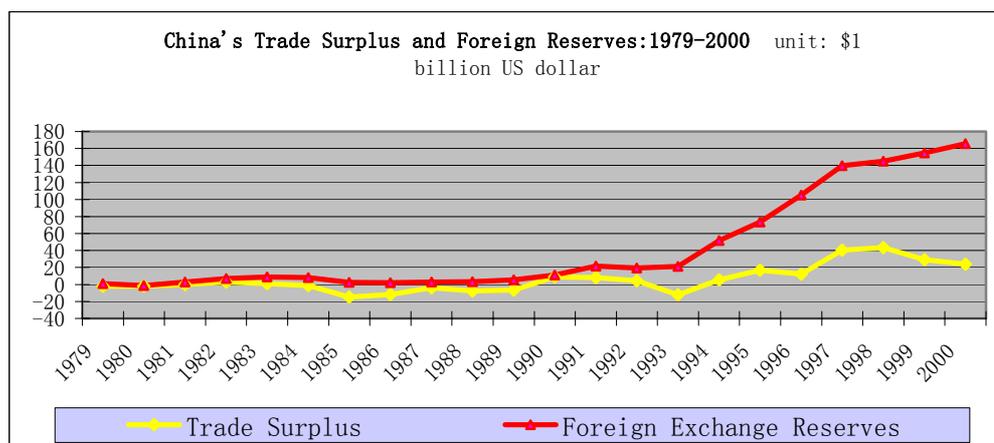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外贸盈余和外汇储备

数据来源: China Statistics 2001.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认识到国际金融中过度资金流动的危害，因为金融自由化加剧了金融市场上的国际投机活动。均衡经济学者认为面临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可以用汇率浮动的办法引入西方大国的价格体系，作为国内宏观调控的参照系，有如航船的固锚效应。其结果，转型经济一旦失去国家汇率管制的保护，就如风暴中离开港湾的小船，只能任凭风浪摆布。新古典货币理论中，货币和汇率在一般均衡的乌托邦世界中只被视为交易手段。在远非均衡的垄断竞争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硬通货也享有伴随政治经济强国产生的市场强权

(Goodhart, 1998)。货币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完全无视货币和汇率控制的建设性作用，以及贸易中的选择过滤效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在 90 年代中就对笔者评论说，中国用辛苦赚来的外汇去进口先进技术，比俄国用出口资源换得的外汇去稳定金融聪明的多。

均衡经济学片面强调价格的供求关系，忽略经济结构的重要性。人首先是生物而非机器。众所周知，在演化生物学中，生物结构例如如细胞和遗传基因在生命演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机体中选择性开放的细胞膜相当于生物系统中的麦克斯韦妖精，为维持开放系统中的耗散结构，它允许有益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通过，但阻挡有害的物质流和信息流（普里果金，斯唐热，1987）。如果缺乏生物膜的保护作用，在远离均衡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生物能在多变的环境中维持内部稳定的活的机体。这是机器和生命之间的基本差异。在政治经济里存在类似的生物边界或细胞膜，例如国界、户籍、信用、签证、外贸与外汇管制等制度，严密地保护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自由”市场，只存在选择性开放的市场。和 19 世纪英国主导下的全球化相比，20 世纪后期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对劳力流动、资本流动、和商品流动的限制要大的多。因为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从贸易持续顺差转为持续逆差，从资本输出国变为资本输入国，所以更加依赖金融强权来维护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

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市场的提倡者以为自由化政策比外汇管制更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他们想不到任何长期投资者首先关心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苏东早熟的贸易自由化导致的宏观不稳定，引发的不是外资流入，而是资本外逃和资产剥离。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确在吸引外资上取得巨大成功。吸引外资的要素不仅是经济稳定与市场潜力，还有其他配套政策。中国能够对外资实行税收减免和租地优惠等政策，基础恰恰在产权以公有制主导的多元混合经济。中国假如在经济未能起飞之时，就推行国企和土地私有化政策，只能导致经济衰退。廉价拍卖国有资产也无法弥补巨额财政赤字，如何还有财力去搞基础设施和招商引资？

四、复杂动力学，路径依赖，和学习空间

假如均衡理论正确的话，收敛学派充满信心地预言，建立产权和价格放开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系应当顺利转型和稳定增长。令他们大惑不解的是，苏东迅速自由化的直接结果是通货膨胀螺旋上升，货币不断贬值和生产大幅下滑（见表 5、表 6）。

表 5. 转型中的高通胀

国家	通胀率 (%) (年份)	高通膨(>40%)的时间长度(年)
----	--------------	-------------------

德国	9 (1990)	0
中国	25 (1988), 25 - 35 (1992-95)	0
波兰	140 - 413 (1988-1992)	5
保加利亚	150 - 230 (1991- 1997)	7
罗马尼亚	117 - 1260 (1991- 1995)	8
乌克兰	50 - 2850 (1991- 1996)	6
俄罗斯	150 - 2600 (1991 - 2003)	11

数据来源: the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atabase

(<http://unstats.un.org/unsd/databases.htm>).

通胀指标为用现价计算的 GDP 平减指数 (GDP deflator)。

表 6. 本币汇率的变动 (以 1980 或 1991 年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为基准)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1	1993	1995	2000
德国	1	1.62	0.89	0.91	0.91	0.79	1.17
中国	1	1.96	3.19	3.55	3.85	5.57	5.52
捷克			0.77	1	1.04	0.95	1.38
斯洛伐克			0.61	1	1.04	1.01	1.56
匈牙利	0.44	0.67	0.85	1	1.23	1.68	3.78
波兰		0.01	0.90	1	1.71	2.29	4.11
保加利亚				1	1.55	3.78	0.12
罗马尼亚	0.22	0.24	0.29	1	9.95	26.62	284
白俄罗斯			0.51	1	191	47937	108
俄罗斯				1	195	897	5534
乌克兰			0.5	1	634	20602	76087

汇率以美元为参照衡量。所有的汇率根据基期汇率重新计算过，中国、德国以 1980 年为基期，其它国家以 1991 年为基期。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2002 (http://pwt.econ.upenn.edu/php_site/pwt61_form.php)

假如采用联合国的汇率数据计算，俄国从 1990 年到 1998 年按 1990 美元计量的 GDP 总值下降了 43%，但是同期卢布相对于美元的汇率贬值了 13,860 倍！这是汇率的均衡理论例如购买力平价完全无法解释的惊人事实，只能由政治经济学中金融强权的博弈来理解。难怪东欧原有的大型国企和国有银行几乎全部被跨国公司廉价收购。

表 5 和表 6 显示中国转型的特征是低通膨率和相对稳定的汇率，这和苏东的情况明显不同。我们在这里提出两个可能的解释：路径依赖和学习空间。

（一） 货币政策的约束条件和通胀产生的路径依赖

一个值得深思的观察是所有低通膨率的转型国家，像中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在 20 世纪前半段都遭遇过恶性通货膨胀。中国在内战中、中欧国家在两次世界间经历过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沉重记忆，构成对这些国家政府货币政策行为的严厉约束，而和这些国家的领导更替并不相关。相比之下，前苏联在计划经济下有价格长期不变的历史，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在前苏联各国并无贴近的先例。这说明历史因素或“路径依赖”确实影响政府经济的行为 (David, 1985; Arthur, 1994)。新古典宏观经济动力学模型为了数学求解的方便，只考虑价格变动没有记忆的马尔可夫过程。历史告诉我们必须面对更为复杂的现实。

（二） 价格双轨制下的复杂模式：生产周期和迂回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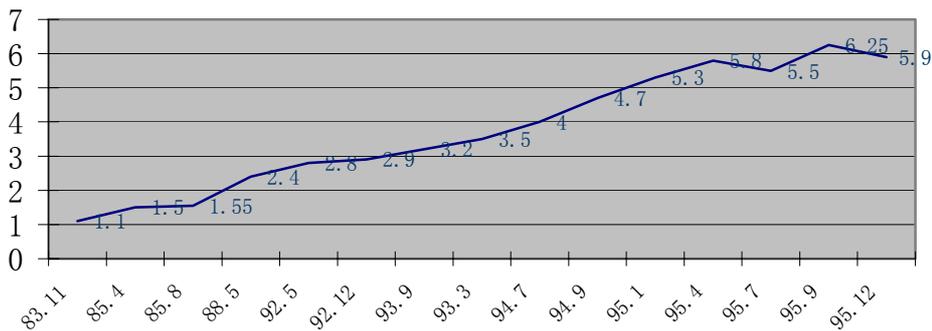
中国从 1984 年起采用的价格双轨制曾经在国内外引起过极大的争议。当时价格双轨制的引进具有双重目的：其一是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暂时维持计划体制下固定价格的食物和原料配给，以保持社会安定，并给生产企业创造适应市场变化的学习空间；其二是允许企业生产超出政府指标以上的产品以市场价销售，利润留成，用市场机制鼓励企业增加供给。双轨制的短期代价是套利引起的投机和腐败行为，以及政府为社会稳定支付的价格补贴。美国货币学派的鼻祖弗里德曼在 1988 年会见中国领导人时，提出砍蛇尾多次不如一次的说法，建议中国迅速实行价格并轨。结果“价格闯关”的信息刚一披露就引发群众的抢购风潮。和苏东多数国家迷信西方权威的领导人不同，中国领导人相信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政策是在试错过程中决定取舍。社会动荡促使中国立即放弃

全面迅速的价格并轨，转而按市场实际分散决定价格并轨的进程，结果避免了东欧式的螺旋通胀和生产下降，应当说得远大于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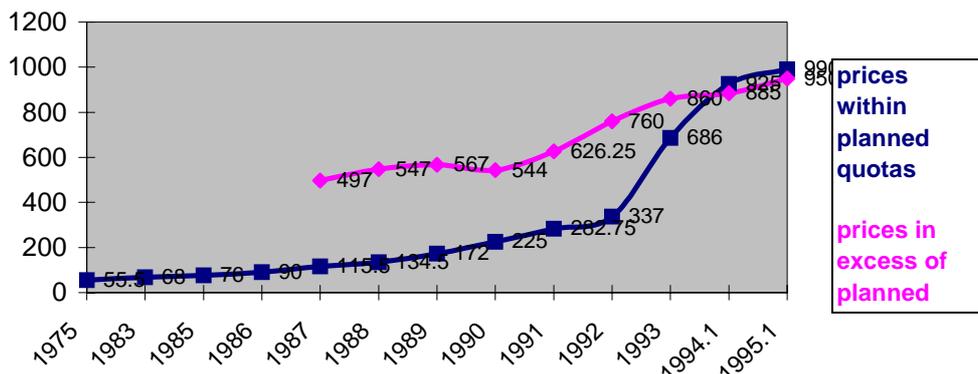
改革过程中实际形成的价格动态在市场上的变化因产业结构大不相同，给我们观察工业结构和复杂动力学的存在提供了丰富证据。产出增长引发的价格并轨首先发生在副食品，例如蔬菜，肉类，和水产市场。副食品价格在一开始确实有所上升；但是几个月后，副食品供给迅速增加，价格很快稳中有降。基础原料，如粮食、棉花等，长达十年间价格管制时松时紧，价格没有完全放开，以防止价格的大幅波动。工业产品的价格放开后，消费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有所下降，但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放开要慢得多。能源、公用事业、教育和卫生等部门的产品价格虽然一直在严格的价格控制之下，价格变化的趋势仍然持续上升，原因是这些部门建设的周期长投资大，供给的增加始终赶不社会需求的快速增长（见图2）。

Retail Price of Fresh Pork Meat in Shanghai 1983~1995

unit: ¥/500g



(3a)



(3b)

图 2. 中国上海地区市场的历史价格。

(a) 零售新鲜猪肉价格； (b) 重油的双轨价格。

要理解价格动力学在不同产品市场上的多样行为，一个重要的机制是不同产品有不同的生产周期。蔬菜和肉类的生产周期只有几个月，电站的投资周期的时间跨度却是几年。价格行为的复杂性可以用劳动分工下迂回生产的程度来理解 (Hayek, 1935)，其复杂性和个体生产者之间发生的供求关系的简单均衡无法相比。尽管粮食和棉花与蔬菜和肉类的生产周期长度相似，但是粮食和棉花除了居民消费之外，还用于工业原料。工业原料供应链的长度远远大于居民消费，库存周期和期货市场的存在给粮食和棉花市场带来复杂的连动关系，包括期货市场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所以，粮食和棉花市场的价格波动比蔬菜和肉类市场的更大、更持久，中国在粮食和棉花市场上的价格改革几经反复，比其它农产品市场上的改革慢得多。为赢得社会大众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中国政府尽力维持价格平稳过渡的努力，付出的财政代价远低于苏东各国，为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中国和苏东在工业结构之间的差异，也可以部分解释承包制对农业和工业的不同效果。家庭承包责任制对中国家庭为主的小规模农业生产有显著成效，但对前苏联的集体农业效果很差，因为苏联集体农庄采用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农机零部件的供应维修体制一旦运转不灵，农民积极性就无法施展。同理，中国工业企业的承包制改革的效果也不如农村。劳动分工网络的复杂性，这是产权理论有意忽略，而复杂经济学着重研究的领域。

从经济理论而言，中国价格双轨制的实验，否定了新古典的简单供求均衡理论和有效市场理论，支持奥地利学派尤其海耶克关于迂回生产下的价格发现理论，以及现代的经济复杂性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鲁滨逊·克鲁索式的简单个体经济难以理解商业周期的复杂性和劳动分工的分岔演化 (陈平, 2002)。由于工业为农业提供种子、肥料和水电等要素投入，当代农业经济也已经工业化，不同产业网络密切相关。粮食、棉花和基础原材料的供应链远比终端消费品长，所以其价格变动的周期和摆幅也大。如果供求曲线的均衡点只有单一交点，而且价格调整的时间滞后趋于零，市场的价格机制在外部冲击下可以迅速回归稳定。然而，如果非线性的供求曲线存在多个交点(多均衡态)，恢复均衡的时间滞后又不断，市场价格的动力学将不能保证价格波动必然趋于稳定，反有极有可能陷入混沌和复杂周期的持续振荡 (Chen, 2005)。非线性供求曲线的例子包括市场上的从众行为与时尚心态导致的 S 形需求曲线，信用配给的弧形曲线，以及劳动供给面临生存下限与生理上限时的 W 形曲线，都是产生复杂周期波动而无简单稳定均衡的例子。正因为存在经济动力学的复杂性和经

济转型的不确定性，中国“摸石头过河”的改革用分散试验，经济特区，和价格双轨制等方法，分散了改革试验的风险，给企业创造了适应开放竞争的时间与空间，也为政府体制改革创造了学习机会。

与中国的渐进的价格放开政策相反，同样面临短缺经济的苏东国家，不是用发展生产的办法来缩小价格波动的差距，而是用一夜间全面放开价格的办法实行转型的大跃进。结果高通胀使居民几十年的储蓄化为乌有，真实收入下降导致的经济萧条，带来的不是市场繁荣而是百姓贫困。休克疗法的拥护者辩护说，至少价格均衡消除了短缺经济下排队的时间浪费，却无法面对经济萧条的现实。苏东转型的惨重代价应当换来经济学的新思维：应当认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制定政策上的严重局限。价格机制不仅是微观的供求关系，而且关系到宏观的周期波动！

五、简单片面的均衡思维和互相矛盾的经济政策

表面看来，华盛顿共识为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给出一张完整的政策清单，除了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建议之外，其设想也包括加强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社会保障的投资。问题是实现任何一个社会经济目标都需要财政投入，萎缩经济中捉襟见肘的政府如何能够全面出击？！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毕其功于一役的幼稚想法，造成众多政策目标之间相互冲突，缺乏可操作的改革策略和先后顺序，在实践中带来恶性循环。我们研究转型萧条带来的历史教训，就要理解复杂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基本道理，寻求比简单均衡思维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更好的理论工具。

（一）微观的硬预算约束和宏观的信用紧缩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把软预算约束作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缺乏效率的主要原因（Kornai 1986; 科尔内, 1988）。科尔内的理论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高度评价，也对苏东的经济学家产生重大的政策影响。苏东国家纷纷在转型过程中不加区别地削减政府给亏损企业的援助，以为可以刺激企业提高效率，同时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其结果加速国企的倒闭而非增效，大量失业造成社会成本急剧增加，从而强化而非减轻转型萧条。

从模型来看，科尔内的软约束理论完全符合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但仔细分析，严格意义上的硬预算约束只存在于没有技术进步和信用市场的封闭经济，这正是完全市场假说的致命弱点。在工业社会中，鼓励技术更新和结构调整的软预算约束以各种形式广泛存在，如银行信用、风险资金和银行破产法（崔之元，1999）。美国破产法的第 11 章，就由法院下令限制债权人的要求，给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以重组和生存的机会。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由国会授权贷款挽救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一的克莱斯勒公司 (Chrysler)，20 世纪 90 年代美联储出面组织金融集团挽救著名的长期资本

投资基金(Long-Term Capital)，这都是美国因为这些企业社会影响“太大不能倒闭”，而采用软预算约束的著名例子。这里，考虑让企业破产还是重组，不仅是企业本身的财务状况，而且要估量企业倒闭在社会上产生的连锁反应。在经济转型中强制实行硬预算约束带来信用紧缩，其理论之荒谬与大萧条时期实行的货币紧缩政策如出一辙。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信用紧缩导致的生产链断裂是产出下跌的重要因素(Calvo and Coricelli, 1992; Blanchard and Kremer, 1997)。

中国人早就意识到，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国际竞争。任何公司生死存亡的关键是更新技术而非产权清晰。中国政府在面临国际竞争又缺乏外援的情况下，致力于改善国有企业竞争的宏观环境，以进口先进技术和开辟新兴市场。中国正是在所谓的企业软预算约束情况下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取得的技术进步，反映在以两位数字增长的制造业出口业绩。从产权学派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产权都不明确，效率应当低于私有企业。但是，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信用的中小企业贷款也需政府扶助。在乡镇和地方政府企业的发展初期，地方政府持有的公司股份，有助于公司从银行获得贷款，缩短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当然，软预算约束也可能用于延缓不良企业的破产兼并过程，这从微观企业来看也许并不优化，但从宏观来看，让亏损企业分批关闭比让大批企业同时破产造成的社会损失小的多，因为企业倒闭的恐慌会传染给本来可以生存的企业。这一经验也为亚洲金融危机处理的不同结果所证实。

历来西方学者和国内的启蒙学者把儒家文化的保守传统视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想不到被理论家认为保守落后的中国农民与机关干部在改革开放中勇于下海。从金融工程的角度观察，中国在软预算约束下的渐进市场化，同时伴随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的金融创新。中国的政府部门和国企干部下海经商可以留职停薪，进城农民找不到工作可以继续回乡承包集体土地；如果国有企业或乡镇企业在新产品市场上取得成功了，就用股份制的办法承认新兴的企业家和经理人的贡献；如果企业改革失败，国有银行承担了主要的改制成本。中国发展投资创新型而非消费补贴型的软约束，目标不是为了选票维持福利制度的既得利益，而是政府承担技术换代过程中的学习风险与创业风险。当然，软预算约束下必然要付某种社会成本，形式之一是中国国有银行累积的不良贷款，其中包括浪费腐败和其他社会成本。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私有化可以使社会负担极小化，从而达到最佳的社会效率，这并非事实。苏东硬预算约束政策下造成的转型萧条，日本试图维持土地泡沫造成的十年停滞，和美国维持私营部门高额利润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其社会成本都高于中国的转型成本。西方经济学家多次预言中国的金融危机，也有不少的经济学家置疑美国还能维持多久贸易和预算的巨额赤字；其答案不取决于预算约束的强弱，而是相对于社会成本能够换来多少的市场扩张和科技进步。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

对中国与美国的财政政策同样适用。我们认为，中国以增长为导向的发展战略是凯恩斯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新发展，而科尔内主张的硬预算约束是新古典反凯恩斯革命在转型经济中的变种。中国和苏东转型经济的不同结果表明：宏观经济环境对微观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远大于微观基础论所谓的理性预期和自愿选择。换言之，政府宏观政策的作用不仅不应削弱，而是要加强。政府政策的目标不仅是通胀和失业，而且要维护社会的创新环境，推动企业的学习，创新，以适应国际竞争的挑战。

软预算约束理论，就微观经济学而言，是应用新古典的优化方法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次幼稚练习；但就宏观经济学而言，却是一个缺乏世界经济史常识的谬论。如果多数国有企业的生存全靠软预算约束下的政府补贴，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必然比市场经济国家高得多。然而历史数据显示：持续的预算赤字和恶性通货膨胀的例子是实行市场经济的拉丁美洲，也包括一次大战后的欧洲，而非计划经济国家。科尔内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得失的分析是一叶障目。

我们对转型经济的观察，支持演化经济学家熊彼特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不支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论与产权趋同理论的立场。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动力来自技术和组织创新，因而具有内生不稳定性，开放经济中“创造性毁灭”表现在持续的商业周期和不断的金融危机。相比之下，社会主义体系要比资本主义稳定。计划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竞争的激励，而是闭关政策造成的技术停滞和机构臃肿。中国改革的建议表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成功途径，不是创造什么硬预算约束下的纯粹私有经济，而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发展对世界市场和新科技开放的、多种经济体制合作竞争的混合经济。

（二）公司金融理论和产权学派的矛盾见解

产权学派声称私有产权是市场有效的基本条件，这是推动私有化政策的基本信念。然而，这一理论即使在新古典的公司金融理论中也得不到支持。公司金融理论的MM（Modigliani-Miller）定理表明：在竞争市场上的公司资产价值与债务结构无关，也就意味着与产权结构无关（Modigliani and Miller, 1958）。萨缪尔逊也指出，交易成本的模糊概念，削弱而非强化对现实世界中产权分配的理解，只有在乌托邦经济中（包括没有规模效应，产品无限可分，自由进入，要素产权分散，知识共享，完全市场等理想条件），自利追求才会达到帕雷托最优（Samuelson, 1995），从公司治理研究的角度观察，缺乏私人控股的国企和股权分散的私企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影响上市公司业绩的主要因素是科技、管理、公司战略和规模经济等因素，所有制形式的影响并不显著。已有的历史经验表明：过度的国家所有制，例如前苏联几乎完全的国有制，会妨碍技术创新；中小型私有企业是多数国家创造就业的主要力量，大型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同样具

有竞争力。然而，涉及公共产品的大型企业，没有明确证据说私有化必然会改善公司的服务和效率（魏伯乐，2006）。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趋势是资本的社会化，分散持股的退休基金会等机构投资者取代私人大股东成为大公司主要的资产所有者，中国大型国企的改革方向应当是社会化而非私有化（史正富，2006）。中国出口产业低劳动力成本的秘密在于中国的混合社保体系的低社会成本，大量农业人口的社保是依靠集体土地，而非私人基金或国家财政。如果中国在农业人口占极大比例的情况下实行东欧式的集体土地私有化，其直接后果将是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成本急剧升高，使基础建设和出口增长显著放慢，长期后果可能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恶化而非改善，例如印度式的城市贫民窟和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流民暴动。

（三）竞争政策与私有化政策的优先顺序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大型国企常常在所处行业中居垄断地位。大型石油和公用事业公司为政府创造了相当的财政收入。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必须优先推行竞争政策，打破国有大企业的垄断，才能鼓励中小企业的竞争和创新。西方的先例有美国政府打破 AT&T 对电话的垄断，有效地改善了电信市场的效率和创新。中国成功的案例之一是打破中国民航的垄断，把它分割为几家相互竞争的公司，结果表明竞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没有显著的区别。相反，俄国私有化优先的政策不仅没有打破，而是强化大企业的垄断，不仅没有促进经济效率的改善，反而削弱了公共财政以及公众对市场化改革的支持。公共财政的崩溃带来灰色经济的兴起，迫使地方政府的行为从“帮助之手”恶化为“攫取之手”（Frye and Shleifer, 1997）。

六、结论：从静态均衡到复杂演化的经济观

大萧条和转型萧条都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两起自然历史实验，曾经催生和也将继续启发新的经济思维。大萧条揭示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非均衡非稳定的复杂特征，凯恩斯提出政府在管理经济周期和宏观稳定方面应当起积极作用。后冷战时代发达国家的企业出走，揭示了福利国家和大政府的局限，唤醒大家关注熊彼特企业家精神和海耶克的自组织演化。转型经济实验给我们提出历史的新经验和新课题：我们面临技术急剧变革的时代，相应地，经济组织，经济体制，和政府功能也要向不断创新的方向协同演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受牛顿机械论影响的均衡经济学已经远远落后于开放社会的发展。我们需要一个更一般的理论框架，可以用来研究经济更新演化的复杂机制，理解新型全球劳动分工的历史经验。我们在这里简要地讨论转型经济实验对新经济思维的可能启示。

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批评华盛顿共识不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Stiglitz, 2004）。罗兰指出用演化观点研究制度的重要性（Roland, 2000）。休克疗法的倡导者之一的萨克斯也认识到：经

济像人体一样是复杂系统：“经济学者需要像医生诊断那样”研究病史的资料，不能相信万能的药方（Sachs， 2005）。这些观察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出均衡思维的简单性和局限性，以及研究历史过程和多样发展的重要性。我们要从他们的观察出发，系统综合，更上层楼。

第一，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其本质没有技术革新的静态原子模型。完全竞争的完美市场是远离工业社会的小农经济模型。要理解复杂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条件下市场竞争的动态机制，可以借鉴理论生物学的非线性竞争模型，研究非均衡的系统变迁（陈平，2002）。

第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代表者模型抽象掉宏观运动的社会性质，忽视金融中介的关键环节，就无法理解经济波动的内在根源。经济周期的历史经验和转型经济的严重教训表明，不是宏观涨落的微观基础，而是微观行为的宏观环境，对经济增长和波动有重大影响。金融凯恩斯主义指出金融内生的不稳定性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Minsky， 1975）。我们进一步证明技术革新的创造性毁灭经济周期的根源。宏观经济的微观—中观（金融中介和产业结构）—宏观的三层次模型，比目前流行的微观—宏观的两层次模型，可以更好地理解结构调整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地位（Chen， 2002）。

第三，开放经济中的社会演化和制度变迁是像生物演化一样的分岔过程，不是交易成本和产权学派所描述的封闭系统中的收敛过程。光靠清产权清晰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难以抑制垄断和鼓励创新，没有技术标准和产业政策的规范，难以发展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经济要有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培育对市场 and 政府都有建设性约束的“纪律之手”（disciplined hand），例如工艺、质量、环保的标准，竞争、破产、兼并的规则，和对垄断、腐败、犯罪等负面影响的限制。现代科学和世界市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揭示出混合经济中市场部门、公共部门及非营利非政府的民间部门之间，合作制衡的重要性，不能片面发展私有经济或国有经济。混合经济的历史教训应当成为新政治经济学和演化制度经济学的中心课题（崔之元，1999；史正富，2006）。

第四，均衡趋同的世界观希望看到“历史的终结”（Fukuyama， 1993），但难以理解转型经济的分岔和大国的兴衰。从复杂科学的角度观察历史，社会演化的动力学存在复杂性和稳定性之间的消长（trade-off）关系（Chen， 2005）。在经济波动较小的平稳环境里，劳动分工会向多样性增加的方向发展；反之，剧烈的经济波动会扭转发展的趋势，劳动分工会向以物易物或自给自足的阶段倒退。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国，研究劳动分工的历史经验和未来发展，有助于我们看清中国在建设 21 世纪国际新秩序的可能地位（陈平，2004）。

总而言之，均衡经济学忽视了市场不稳性和经济复杂性的两大根源：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的多均衡态和社会潮流影响下的集体行为。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可以和达尔文对演化生物学的贡献媲美（恩格斯，1972）。用复杂科学的方法和演化经济学的观念研究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有

助于我们超越均衡经济学的局限，打开更广的历史眼界。中国基于学习、创新和分散试验的新经验，可能是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实验。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对经济科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致谢

感谢众多经济学家在多次经济学研讨会上的建设性批评，包括 2005 年在德国耶那马克斯—普朗克经济系统研究所举行的“德中演化经济学”研讨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伦敦经济学院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的北京研讨会，上海复旦大学的“转型与发展”国际研讨会，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中国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及在罗马俱乐部布鲁塞尔分部和欧盟信息社会的讲演。诚挚感谢 Joseph Stiglitz, James Galbraith, Hans-Walter Lorenz, Guido Buenstorf, Danny Quah, Linda Yueh, Charles Goodhart, 林毅夫, 胡永泰, 崔之元, 刘昶, 史正富, 张军, 陈志武, 胡汝银, 李维森, 袁之刚和温科红等关于华盛顿共识和产权学派的讨论。

作者感谢中国科学基金会 70471078 号拨款、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11 工程和上海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给予的资助。也感谢石敏女士在写作中的帮助。

参考文献

- 陈平, 2002: 《劳动分工的起源和制约—从斯密困境到广义斯密原理》, 《经济学(季刊)》, 第 1 卷, 第 2 期.
- 陈平, 2004: 《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崔之元, 1999: 《看不见的手的范式的悖论》, 经济科学出版社。
- 恩格斯, 1972: “在马克思目前的演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第 574 页, 人民出版社。
- 凯恩斯, 1997: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徐毓译, 商务印书馆, 第 2 版。
- 科尔内, 1988: 《突进与和谐的增长: 对经济增长理论和政策的思考》, 经济科学出版社。
- 科斯, 1994: 《论生产的制度结构》, 盛洪, 陈郁译,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 林毅夫, 蔡昉, 李周, 1999: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卢卡斯, 2000: 《经济周期理论研究》, 朱善利等译, 商务印书馆。
- 马歇尔, 1964: 《经济学原理》, 朱志泰, 陈良璧译, 商务印书馆。
- 普里果金, 斯唐热, 1987: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 曾庆宏, 沈小峰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史正富, 2006: 《民营化还是社会化: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 上海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

-
- 中心。
- 魏伯乐等编，2006：《私有化的局限》，王小卫等译，上海世纪出版公司。
- Arrow, K.J., and G. Debreu, 1954, "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 22(3), PP265-290.
- Arthur, W.B., 1994,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arro, R., 1991, "Eastern Germany's Long Haul,"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3.
- Blanchard, O. and M. Kremer, 1997, "Disorganiz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2(4), PP1091-1126.
- Burda, M.C., 2006, "What Kind of Shock Was It?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Eastern Germany after Unification," *AEA 2006 Annual Meeting*.
- Calvo, G. and F. Coricelli, 1992, "Stabilizing a Previously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Poland 1990," *Economic Policy*, Vol.14, PP175-208.
- Chen, P., 1993, "China's Challenge to Economic Orthodoxy: Asian Reform as an Evolutionary, Self-Organizing Process,"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4, PP137-142.
- Chen, P., 2002,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the Laws of Probability Theory: the Principle of Large Numbers vs. Rational Expectations Arbitrag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 49, PP327-344.
- Chen, P., 2005, "Evolutionary Economic Dynamics: Persistent Business Cycles, Disruptive Technology, and the Trade-Off between Stability and Complexity," in Kurt Dopfer ed., *The Evolutionary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Chapter 15, PP.472-50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CIA. World Factbook.1968-2006.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 David, P.A., 1985,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75: PP332-37.
- Fama, E.F., 1970,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Work," *Journal of Finance*, Vol. 25, PP384-433.
- Frisch, R., 1933, "Propagation Problems and Impulse Problems in Dynamic Economics," in *Economic Essays in Honour of Gustav Cassel*, George Allen & Unwin, London.
- Frye, T. and A. Shleifer, 1997, "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Grabbing H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7(2), 354-358.

-
- Goodhard, C.A.E., 1998, "Two Concepts of Money: Implications for the Analysis of Optimal Currency Area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4, PP407-432.
- Hayek, F.A., 1935, *Prices and Production*, Routledge, London.
- Kolodko, G. W., 2000, *From Shock to Therap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Kornai, J., 1986,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Kyklos*, Vol. 39(1), 3-30.
- Minsky, H. P., 1975, *John Maynard Keyn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Modigliani, F, and M.H.Miller, 1958,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Amer. Eco. Rev.* Vol.48(3), PP261-297.
- Roland, G., 2000,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 Politics, Markets, and Firms*, MIT Press, MA: Cambridge.
- Romer, C.D., 2004, The Great Depression, *Britannica Encyclopedia*, Chicago.
- Sachs, J. D., 2005, *The End of Povert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Samuelson, P., 1995. "Some Uneasiness with the Coase Theorem,"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Vol.7, PP1-7.
- Schumpeter, J.A.,1939,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McGraw-Hill, New York.
- Stiglitz, J., 2004, *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 Consensus*, 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
- Williamson, J., 1990,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John Williamson ed. *Latin America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 World Bank, 2002, *Transition, the First Ten Years, Analysis and Lessons of Eastern Europe and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